

· 科技评述:2024年诺贝尔奖评述 ·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长期增长动力探源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述

董丰 孙浩宁*

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 因对“在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经济繁荣”方面的研究贡献,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三位教授被授予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经济学家通过创新的实证策略,发现社会制度是影响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他们也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制度形成的内生机制。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中最为重要的话题之一,本文系统总结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对于制度经济学视角下增长动力的相关研究,讨论了其研究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启示,并展望了相关理论研究的发展前沿动态。

[关键词]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增长;经济体制改革

202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经济学家,分别为麻省理工大学教授达龙·阿杰姆奥卢^①(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以及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以表彰他们在“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经济繁荣”方面的研究贡献。阿杰姆奥卢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现任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他的研究涵盖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其最著名的贡献在于阐明了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同时关注技术变革对劳动市场的影响等;约翰逊现任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教授,研究集中在国际经济、发展经济学以及金融危机等领域,尤其关注制度改革如何实现危机后的恢复以及长期经济增长;罗宾逊现任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尤其专注于政治与社会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发展^②。

经济增长一直都是经济学领域最为重要的话题



董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宏观经济,聚焦资产泡沫、系统性风险、绿色转型和货币财政政策协调等议题,在国内外顶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and 原创探索计划项目及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等。获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等奖项。



孙浩宁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重点关注资产泡沫、宏观金融、生产网络等研究议题。

之一。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曾感叹:“一旦开始思考经济增长问题,就再也不会去想其他事情。”阿杰姆奥卢、约翰逊和罗宾逊通过一系列创新的实证

收稿日期:2024-10-17;修回日期:2024-11-27

* 通信作者,Email: sunhn22@mails. tsinghua. edu. cn

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250064,72122011)的资助。

^① Daron Acemoglu 是土耳其裔经济学家。维基百科将其姓氏翻译为阿杰姆奥卢,这也是最接近土耳其语发音的翻译。中文网络里对其姓氏的另一个流行翻译是“阿西莫格鲁”。

^② 事实上,三位学者的研究领域和所取得的成就不仅限于制度与经济发展领域,但考虑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往往专注于某一个主题,本文着重梳理三位经济学家在制度的形成与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方面的相关研究。例如,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经济学家彼得·戴蒙德、戴尔·莫特森和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以表彰他们对市场摩擦和匹配的分析,而戴蒙德在交叠世代模型和社会保障等其他领域也颇有建树。

研究,揭示了社会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即更加开放包容的制度往往带来更为积极的创新和更快的经济增长;同时,他们也从理论上讨论了为什么不同制度会在不同国家形成,强调了精英阶层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对社会制度的内生选择。三位经济学家的一系列研究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解释了不同国家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深化了对于制度改革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本文简要总结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的开创性贡献,并探讨其研究成果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示。

1 经济增长背后的制度性因素

为什么某些国家相比另一些国家长期增长更快?阿杰姆奥卢、约翰逊和罗宾逊基于实证分析发现,社会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更为包容性(Inclusive)的制度中,个体产权得到保障,机会更加平等,创新得以促进,经济长足发展;而在更为掠夺性(Extractive)的社会制度中,个人的创新和生产成果可能被掠夺,因而缺乏创新和生产的动力,长期经济发展受到抑制。在2001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论文《经济发展差异的殖民起源:一项实证研究》中,三位经济学家利用殖民者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识别了社会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1]。作者认为,在殖民者死亡率越高的地方,殖民者越容易建立掠夺性制度,即扶植代理政权在殖民地掠夺资源(例如比利时对刚果的殖民);相反,在死亡率较低的殖民地,殖民者往往在当地定居并发展生产,从而形成“新欧洲”(Neo-Europes,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由于社会制度的改变通常面临较大成本,殖民者所建立的制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地区现今的社会制度,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同时,殖民者死亡率通常受当地长期以来的疾病等因素影响,本地人则因已经适应了环境,这些因素与本地的生产活动相关性较弱。三位经济学家在2002年发表的论文《命运的逆转:地理和制度在现代世界收入分配中的作用》进一步发现,在曾经被欧洲殖民的国家中,500年前较为富裕的国家如今往往更为贫穷^[2]。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殖民者在原先较为贫穷的国家中更容易引入鼓励投资与创新的新社会制度,使这些国家更容易实现资本积累和工业化。在阿杰姆奥卢和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何失

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一书中,两位作者进一步阐述了社会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即鼓励创新、保护产权的社会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3]。

2 制度产生的内生理论机制

既然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那么制度是如何形成并维持的?阿杰姆奥卢和罗宾逊在2000年发表的《西方为何扩大选举权?民主、不平等和增长的历史视角》一文中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解释了为什么不同国家对于社会制度的选择存在内生差异^[4]。作者指出,社会制度是精英阶层(Elite)和大众阶层(Mass)之间博弈的结果,当大众阶层不相信政府会在未来进行再分配时,公众的革命压力会迫使社会精英阶层选择扩大民主,以维持社会稳定。此后,两位经济学家将这一模型扩展到动态多期博弈的框架中,进一步探讨了社会制度的变迁问题。研究发现,在动态情况下,原有的精英阶级可以通过发展军队或发动政变来镇压革命,因此社会制度的变革可能受到阻碍;从发展与制度的关系来看,技术进步虽然可以提升社会的整体生产力,但它需要包容性更强的社会制度加以使用发展,如若现有的社会精英阶层不愿意改革社会制度发展新技术,经济发展可能因此停滞;由于法定(De jure)权力和实际(De facto)权力的差异,表面的民主制度可能实际上将权力集中于少部分精英阶层手中,从而导致社会制度实际意义上的长期维持,难以实现制度变迁^[5-7]。阿杰姆奥卢和罗宾逊在这方面的贡献启发了后续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深入讨论社会制度内生形成的机制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3 总结与思考

阿杰姆奥卢、约翰逊和罗宾逊的一系列研究表明,社会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制度应当保护私人产权和民主,而政府不应当过度干预资源分配。但他们的研究也引发了一系列的学术和政策争议。从跨国横向比较的视角来看,一些学者认为三位经济学家论文中所采用的“殖民者死亡率”变量构建中存在分类不清等情况,修正并调整样本后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弱工具变量问题;同时也有研究发现,在考虑亚洲其他国家的样本

后,殖民者死亡率对于制度的影响便不再显著^[8]。从历史纵向的视角来看,20 世纪 50~60 年代以来,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过程中,政府的产业政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拉美国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保持民主制度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与北美相比却日渐落后,这都与三位经济学家“民主制度是增长动力源泉”的结论存在矛盾。文一教授^[9]在《国家为什么繁荣》一文中指出,是“战争—贸易”循环背景下的强激励机制诱发了文艺复兴前后的科学革命,欧洲物理、化学、机械技术的发展背后都有战争目的下的贵族激励体制驱动;林毅夫教授^[10]2007 年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中指出,经济结构内生于经济禀赋,政府可以基于比较优势调整资源分配,以实现最适合本国经济现状的转型发展路径,因此,没有一成不变的“好制度”,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能否实现有机的结合。

在更广义的视域下,阿杰姆奥卢、约翰逊和罗宾逊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制度健全的激励体系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无论是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所强调的民主制度,还是林毅夫等中国经济学家强调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其背后的核心都是让创新者和生产者能够获得与其成果相对应的回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于产权的保护逐渐加强,相继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法律法规,完善了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当前,国家正在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保护企业家的个人安全和财产安全,以立法体系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双重奇迹,但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逻辑,仍然缺乏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系统理论成果。这是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学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科学、准确地诠释中国过去所取得发展成就的机理,同时直面新阶段的国内外挑战,迫切需要凝练出具有原创性的重大经济理论,深入揭示并系统总结中国发展的内在规律,形成基础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体系。展望未来,经济学研究应更加深入地分析制度设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更加全面地厘清政府

和市场的作用分工,系统地总结中国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奇迹的动力来源,以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态度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在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方面取得真正的创新与突破^[11, 12]。

参 考 文 献

- [1] 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A.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5): 1369—1401.
- [2] 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A.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117(4): 1231—1294.
- [3] Acemoglu D, Robinson JA.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2012, 29(2): 168.
- [4] Acemoglu D, Robinson JA. 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 democracy,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115(4): 1167—1199.
- [5] Acemoglu D, Robinson JA.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6] Johnson S, Acemoglu D. 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3, 99(6): 2525—2527.
- [7] Wade RH. 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22, 58(1): 204—209.
- [8] Albuoy DY.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6): 3059—3076.
- [9] 文一. 国家为什么繁荣? ——国民财富的起源与“空想市场主义”的终结. *东方学刊*, 2019, (03): 41—78+119—120.
- [10] Lin J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11] 林毅夫, 蔡昉, 李周. 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 [12] 林毅夫. 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庆祝《经济研究》创刊 40 周年. *经济研究*, 1995, 30(10): 13—17.

Growth Momentum from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2024 Nobel Laureates in Economics

Feng Dong Haoning S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Daron Acemoglu,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Robinson have been just awarded the 2024 Nobel Prize in Economic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to “studies of how institutions are formed and affect prosperity”. Through innovative empirical strategies, the three economists have found that social institution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determines economic growth. They have also discussed the mechanism of institutional formation from a theoretical level. Economic growth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s in macroeconomics. Our paper summarize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2024 Nobel laureates in economics,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ir research for economic system reform, and introduces the frontier of related studies.

Keywords 2024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institutional reform

(责任编辑 陈鹤 张强)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sunhn22@mails.tsinghua.edu.cn